



经济观察

面对新的通胀周期,我们准备好了吗

各国首先还是要保持自身的金融稳定性,自家各扫门前雪;建立区域的金融韧性,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升本币的使用量,减少新兴市场整体对主要储备货币的依赖性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林

令我最为担心、晚上睡不着觉的主要就是发达国家的加息,以及产生的后果。在亚洲地区的资本流出问题。4月22日上午,泰国央行行长塞塔普通过视频连线,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如是说。塞塔普的担忧是有来头的。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,新兴市场往往会面临多重压力。历史上,情况严重的时候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、亚洲金融危机、土耳其货币危机。上一次在亚洲造成的后果便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,泰国货币当局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,货币大幅贬值超过30%。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周期正在开启,全球经济该如何应对?各国央行该如何协调货币政策?我们做好准备了吗?

我们正处于新的通胀时代

2021年来,石油、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飞涨,食品价格攀升,多国房价走高,俄乌冲突进一步推高了粮食、能源产品的价格,通货膨胀风险威胁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都已步入加息轨道。以美国为例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暗示,可能在5月会议上加息0.5个百分点,并表示之后可能需要进行类似幅度的加息以降低通胀。而就在上个月,美联储刚刚决定将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25个基点。如果5月美联储再度加息,所创造的50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将会是2000年以来的首次。

我们正处于新的通胀时代。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滕斯指出,过去一年来通胀上升成为一种全球现象,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5%,过半数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率在7%之上。通胀攀升的原因何在?卡斯滕斯总结

了三点:一是全球总需求强劲反弹,与以往危机后的经济复苏相比,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更快,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。二是需求更偏向于商品而非服务,尤其是需要接触顾客的服务业的需求恢复缓慢。三是面对快速反弹的需求,供应的反应迟钝,这体现在供应瓶颈、交货延误、运输成本上升和关键生产投入短缺等方面。出于上述原因,我们不应指望通胀压力很快缓解。卡斯滕斯指出,新的通胀推动力量已经出现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,由于供应枯竭,食品、石油和许多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。他提醒,我们有理由保持警惕,因为迹象表明通胀预期正在失控。三十人小组董事会主席弗兰克尔认为,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通胀周期。如今全球经济面临的供应链、疫情等挑战都是过去的通胀周期所没有的,而且与过去不同,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市场,因为金融市场有溢出效应。弗兰克尔曾担任摩根大通、美林国际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,也曾担任以色列中

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。政策措施不能仅针对实体要素成本,而要聚焦于降低整体性风险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

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,2016年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。彼时,舆论场上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激烈辩论,玻璃大王曹德旺《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%》的言论更是将讨论的热度推向高峰。到了年末,民间减税的呼声已至顶点。后来的事情,人尽皆知:中国在2016年正式拉开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大幕,这成了本届政府的头等大事。6年时间,新增减税降

央银行行长,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外溢非常了解。他分析称,当通胀率很高时,会逐步转化为价格,价格水平又转化为通胀预期,而通胀预期最后又转化为通胀,通胀又转化为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外溢效应。

既要自扫门前雪,也要倡导多边合作

因为通货膨胀治理不到位,导致金融问题全球性外溢,这类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多次。该如何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出现?塞塔普认为,各国首先还是要保持自身的金融稳定性,自家各扫门前雪,其次是建立区域的金融韧性,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升本币的使用量,减少新兴市场整体对主要储备货币的依赖性。塞塔普以泰国为例称,泰国已更多地采取本币结算的框架,在泰国和马来西亚、泰国和印尼之间,本币的使用占比达到了63%。此外,还可促进区域的零售连接,泰国正在与新加坡建立第一个快速支付系统,包括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老挝、越南、柬埔寨在内的5个东盟国家也会加入,以便促进和提升本币的使用比例,从而提升区域的金融韧性。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文伟预

稳健前行开新局

测,当前美国通胀水平创下40年新高,美联储将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紧缩措施。而美联储一旦加息,对亚洲市场的影响不知会在何时发生,但是对于亚洲的溢出效应一定会非常严重。因此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加息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影响,尤其是对于房地产行业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。我们一定扫好自家门前雪,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干净,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。余文伟表示,香港的经济刚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,美联储加息将会使得香港经济增加压力。对此,中国香港做了一些准备,不仅在宏观经济方面,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作为缓冲,银行体系也需要有足够的流动性。我们面临本地的问题,还有区域性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,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去解决,而唯一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全球性的机制。弗兰克尔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,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方案来处理全球性问题,所以政策沟通、协调与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。塞塔普也认为,应该发展和使用区域内部的金融安全网。在这个方面,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比较紧密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,亚洲国家金融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加强,2010年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正式启动,2012年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扩

政府多年减负,为何有的企业仍感觉成本压力大 减税降费未来该怎么走

费累计超8.6万亿元,我国的宏观税负由2012年的18.7%降至2021年的15.2%左右。更详细的变化体现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。自2016年起,财科院每年都会开展一次企业成本调研,今年发布的《2021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显示,近年来企业税负负担整体呈下降态势,2018年至2020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,年均下降0.87个百分点,超过66%的样本企业的平均税负已低于5%。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,近年来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,特别是疫情期间的政策有效地对冲了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冲击。但是在调研中,他也发现不少问题,比如,减税的乘数效应为什么会下降?减税降费的力度越来越大,为什么有的企业感觉到的成本压力依然很大?刘尚希认为,弄清楚这些问题,谨防其他因素对冲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,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。

企业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

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,作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重要内容,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降低成本政策。通过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,目前,税费负担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已不高。在2021年财科院的调研中,56.5%的企业认为,税费负担合理,7.9%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轻。刘尚希认为,目前,企业真正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。《报告》称,这源自新发展阶段的高风险特点,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都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,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,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例子。企业成本不只是决定于已经发生了什么,而是取决于未来可能的损失即风险,一些企业成本越来越不可预期。在调研中,财科院的学者们发现,在风险社会,不仅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,企业层面的个体风险同样也会外部化,通过各种传导、转化,导致公共风险扩大,带来全方位的成本上涨,从而造成所有企业承压。以房地产业为例,头部企业所引发的债务风险,会产生链条式传导,不仅使得关联的地产商受损,也会带来房地产业投资预期的改变。这种变化还会加大金融机构风险,牵连地方财政,减少土地出让金和相

别增长9.7%和10.6%,较上年末显著上升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以视频形式出席了本次年会,并且做了主旨发言。他指出,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,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全球通胀压力,近期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,这既有外部冲击因素,也有国内疫情散发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内部因素的影响。2022年,人民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,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,上缴安排根据退税和财政支出进度靠前发力。易纲指出,结存利润主要来自人民银行过去几年的利润积累,相当于增加GDP总量1%的财政支出,体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联动,共同发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。他还表示,央行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直达工具的作用,大力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。货币政策聚焦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脆弱群体。3月末,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1万亿元,同比增长25%。最近,人民银行进一步出台了支持实体经济的23条政策举措,包括向受疫情影响的脆弱群体提供支持。

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

很显然将会有上升的通胀,并且我们将预期它会保持一段时期,但是非常有信心地说,这个能够被我们消化吸收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认为,面对当前全球通胀压力,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普遍能够较好地管理通胀预期。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,而且整体有稳定的缓冲。朱民认为,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,利率水平也有很大空间。事实上,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前布局,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。2021年12月以来,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15个和5个基点。截至今年3月底,广义货币(M2)和社会融资规模分

对经济下行压力。中国税务杂志社总编辑、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李万甫认为,“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作用是,促进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切实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。这具体表现为,政府通过税费方式占有的社会资源量减少,把更多社会资源让渡给市场配置,同时,减税降费结合放管服改革,使得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,整个营商环境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极大改善;非税收入大幅削减,各类非税形式的收入统一归税务部门征收,政府收入更加规范化。这位财政学者认为,要达到减轻企业税负,稳定市场主体,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目的,需要综合施策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观察到,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,多数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对冲措施是缓税和扩大财政赤字,较少采取减税和改革税制。因为缓税一般是应对经济周期的,用它来熨平经济周期,经济差时减点税,好的时候再把税增回来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文在《中国税收政策报告(2021-2022)》一书中写道,未来的减税降费应服从于完善税费制度的需要,无论是缓税还是降费,应当是完善制度的一个副产品,如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的改革,而不是短期政策。许文说,减税降费主要是为企业减负,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,进而增加利润和财力,对于稳定企业的短期经营作用很大。但在稳定预期方面,企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,不能仅仅依靠减税降费来解决,需要做长期战略考虑。与此对应的问题是,如果政府长期实施减税降费政策,会给市场主体以“减税降费一直在路上”的预期,可能导致企业被动地等待政策,不利于激发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。他建议,为减少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依赖,应推动阶段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制度化,以更为规范的制度化政策安排来确保企业的合理税费负担水平。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,通过制度性缓税和结构性减税来实施减税降费,以此在经济面临三重压力时构建更大的确定性。显然,在十四五期间,这对政府来说又是一场新的考验。

关税收。当前学界和政府部门研究降成本的思路和措施,大多是从实体要素成本出发,按照税费负担、融资成本、制度性成本、人工成本、用地用能成本、物流成本等分类研究。《报告》认为,对企业来说,分类管控或许短期有效,但从整个供应链观察,上中下游的企业成本与利润是息息相关的,对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,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来说可能就是收益。2021年就出现上中下游成本分担不均的复杂局面。比如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,推升企业原材料成本,中游高耗能企业成本高企,但成本传导至下游企业有时滞,也会和预期有一定差距;下游企业不仅面临原材料涨价增加的采购成本,还面临中上游企业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传导部分,盈利空间被明显压缩。这样的复杂性从数据中也能看出。《报告》显示,近3年,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先下降后上升,分别为84.15元、83.38元和83.64元,呈波动态势。刘尚希说,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。下一步降成本,政策措施不能仅针对实体要素成本,而要聚焦于降低整体性风险。如果以降低成本政策替代企业成本管理,企业就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大礼包。因此,要依靠加大体制机制改革来减少资源错配,防范整体风险,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治理机制,特别是财政关系改革,调动两级政府防风险的积极性;更关键的是要做好预期管理。

税费优惠政策应制度化

持续多年的减税降费政策,在降低市场主体负担的同时,也将宏观税负降低到较低的水平。这相应也带来了财政收支压力和未来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挑战。多名财税学者认为,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已经边际递减,应及时评估政策的有效性,更好应



誓言寄到天安门征集活动 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联合开展 誓言寄到天安门征集活动,即日起至7月1日,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,收集广大青少年的铮铮誓言。团员青年可在明信片上写下对党的二十大的期盼,对共青团的祝福和奋进新征程的决心等内容。主办方在北京天安门邮局设置北京2022 54号信箱,并制作专用明信片。参与者可选择电子明信片直接填写誓词,也可选择邮资明信片寄出。邮资明信片设加盖特制纪念邮戳的收藏联,供参与者留念。 扫码参加活动



4月24日,中铁十二局集团的工人在津兴铁路永清南站桥梁架梁施工现场。当日,津兴铁路永清南站桥梁架梁完成。津兴铁路东起天津西站,西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,全线建成通车后,将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地区铁路网布局,促进京津冀交通协同发展。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/摄